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一三期 ——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8d)

【劫后反思】	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	何怀宏
【追根溯源】	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萧 象
【各抒己见】	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	应学俊
【百家争鸣】	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	诚 言
【抗拒遗忘】	一言难尽说文革	夏 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劫后反思】

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

• 何怀宏 •

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就看是什么痕迹。今年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已经45年过去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死去。而我也关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它们现在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在“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看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揉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外省的、普通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的一代”我想可大致定为在文革开始的一年——即在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大学尚未毕业离校的学生，主要是这十来年的大中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因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主要是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甚至名义了。

这样看我就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2岁，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处在

边缘，主要是观看。我还在1970—71年读了当时南昌唯一还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生活环境的基本特点都是都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然后是“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然而，“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印儿，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是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的。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一个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至少决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作为集体的主人公坚信并渴望着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而从“红卫兵”自身来说，或许可以指出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是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担任先锋，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来的工作组反，造一切可能构成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很少几个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经到了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归来，我们在车站欢迎。在这之前，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人们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一下子这的确是可能了。而且许多事情也可能了，坐车吃饭都不要钱，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一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

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造一切压抑他们的东西的反叛倾向，而他们此时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一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活着的、但却被视作神的人（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一种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也基本上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某些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谁最忠诚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者说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他们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的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只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到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毛泽东、尤其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可能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芝”了。他们以为是在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苍茫大地”，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66年8月1号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68年7月28日召集的一次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就嘎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是“受控”的，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就像上面所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一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本能的冲动，他们的生命力洋溢，而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而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当时并不怎么觉得，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讽刺挖苦的、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跟着去我们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那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革命是盛大的节日”，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

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就是这些少男少女们卷入了暴力。上述的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也就是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先是批斗会的暴力，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从里面推出一个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人们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勇敢、成年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开始的被打死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飞驰的汽车的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尤其是中学生，比大学生似乎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当时南昌特别出名、特别能战斗的一支红卫兵队伍是“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其首领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撮婆”。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那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就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宣队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但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68年就开始动员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一共有1700万人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

我这里想特别说明一下“受命的造反”这一概念。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运动”这一属于文革大运动中的小运动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我们实际无法仅研究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而是可能要始终着眼于他们双方，尤其是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也要分清主次，弄清是领袖还是群众在其中起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正如前述，我是认为是前者在起主要作用的。我们这里实际上要区分两个问题：一是领袖是否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或中心的作用；二是他是否达到了自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甚至是否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运动的过程（或者说不断实现自己的阶段目标）。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对武汉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去目的的总体规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是太强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各种历史合力和一定是“互动”的实践中，任何人其实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说，尤

其是那种远离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目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不管持这一目的者拥有多大的威望和权力。王绍光似乎没有区分上述的两个不同问题。领袖是否一定要全程控制运动乃至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才算“中心”？而我以为，实际上能够成为行动的“主角”（即事件是由自己生发）而不必是“主人”（即通过这些事件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已经可说是“中心”了，已经要在道德上对其负责了。王绍光在其翔实的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那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也可能低估了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尤其是在群众行动中，在“广场效应”中。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红卫兵那里，有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牺牲的精神。包括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是不仅有理性的算计，也有信念、以及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是这样。而且，他们也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就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其实他们后来应该是明白了，他们的“敌人”其实是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他们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也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他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这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王绍光说毛泽东“成功地、甚至是太成功地发动了广大群众，但他却没能成功地指导这场运动。”因为冲突的各派群众“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呢？为什么文革失败了呢？这就涉及到他的目标是否真正符合社会和人们的真正利益或需求了，或者说，即便“符合”的话，也涉及到普通中国人甚至一般的人性是否能够承载他的理想了。或者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假如他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假如他领导的是另一些群众，或者他的战略部署做一些局部调整，他的理想方案本来是不是可以成功呢？但如何去更换群众呢？他发动文革的一个目的不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不就是要创造一代新人吗？但锻炼的结果如何呢？无论如何，我们要考虑植根于人性的可能性问题。未来也许不会有和过去一样的乌托邦了，但是还可能有新的样式的乌托邦。“文革”是怎么失败的，谁也没有办法直接对抗冠以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谁也没有力量正面对抗他发动的“轰轰烈烈”，刘少奇的组织机构不行，老师们的“二月逆流”也不行。“文革”其实是后来悄没声儿地被后来的群众的冷漠打败的，被小道消息的“耳语”打败的。一向响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后来不再积极响应了。动员时代终于到达了它的最高点，它必须达到最高点才能下降。就像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军队没有那个能抗秦军之锋，但是在秦朝二世之后却似乎变得不堪一击。

总之，通过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分配到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们，也就是先前的“红卫兵”们，的确在那里受到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说是一种新的“启蒙”也不为过。而这种“启蒙”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的方向，被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们对领袖的“英明”信念发生了动摇，直到1976年4月、多年来第一次非组织和领袖动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其中许多参与者正是当年的红卫兵），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却为不久之后四人帮的覆灭显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说预先奠定了社会基础。知识青年们开始从下面看世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的艰苦磨炼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认识了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为这种认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青春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就像《文化纵横》上一期所做的

专题“暴戾的中国”中的一组文章所揭示的，在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暴力的事件和暴戾的倾向，以及种种来自体制也来自个人的对生命轻贱的现象，这是否和当年狂飙猛进的“红卫兵运动”有某种关系？甚至更扩大一点说，是否和文革、乃至在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强调、只是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的斗争哲学和暴力主义有关？总之，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对于激荡的二十世纪留给中国的思想和实践遗产，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 原载作者博客 2011-5-17

~~~~~

## 【追根溯源】

### 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 萧 象 •

罗瑞卿在文革前夕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是党内高层第一位因文革而倒台的蒙难者。关于罗瑞卿被打倒的历史真相，在近半个世纪过去的今天，因了一些曾经显赫一时后又遭遇没顶之灾的文革高层人物回忆录的出版与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揭示，加上无远不届的网络神奇传播，开始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1962年林彪患病、贺龙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与贺龙以及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触开始趋于近密，其强悍的工作能力也深得刘少奇的欣赏，一度视为下届的国防部长人选；然而，这在党内高层矛盾斗争日益复杂激烈的1960年代，却引起了久蓄倒刘心计且视军权如命根子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不满，虽然毛并不怀疑罗的忠诚，但罗与刘邓贺关系的密切却不毛为所容忍。因此，作为实现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战略部署之一步，罗瑞卿的工作缺点被任意放大，与林彪的纠结被巧加利用，罗首当其冲成了攻克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之外围障碍清除的第一个牺牲品。罗瑞卿被推上文革祭坛，不堪其辱而跳楼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罪加一等；自杀未遂而致腿残，此后经年备受挨斗受批之折磨，饱经家破人散之苦。

作为文革悲剧之一幕，罗瑞卿的蒙冤遭遇与所有文革受害者一样，充满了屈辱、辛酸、悲凉与苦难，具有命运悲剧的普遍性。但因其位高权重、身处中枢、又为最高权力直接打倒这一特殊性，其跌宕起伏的命运悲剧也就蕴涵着一般命运没有的特殊意味。从权高位重的显赫一时到挨批受斗的忍声吞气，诚为个体命运转化无常的荣辱之变，又何尝不是国家命运从治到乱盛衰之变的预兆，不是全体民族遭遇风暴陷入浩劫的先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瑞卿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对罗瑞卿命运的关注，就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我们自身命运的关注。那么，罗瑞卿命运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先从当年的会议说起。上海会议为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61人参加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扩大进来的与会人员事先不知会议内容。（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一个本由七人组成参加的常委会的会议，将与会人员扩大到九倍，内容只为整肃批判罗瑞卿一人，而大多数常委却事先不与其闻。这明显一反常态有违于党的会议规范与程序正义（如果中央曾经制定过相关的会议规范的话；如果没有，则说明这一方面存在着漏洞）的做法，姑且存而不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们的会上表现则耐人寻味，大可考究。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所著《红色家族档案》引述《康克清回忆录》：会议之后，朱德心情不畅，哀叹说道：“肃

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朱德尚抱这样看法，关系密切的刘邓更当如是。那么，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多数中央常委们，当毛抛出罗的问题，决定打到罗时，为什么不为罗说话，施以援手，而听之任之呢？就是一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待遇，遭遇不实指责与诬陷时，也应给予起码的公道，何况刘邓与罗之间还有良好的私谊。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并为之遗憾。尤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在随后北京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所有的同志一夕之间反目成仇，流露出“十分敌视的目光”，罗瑞卿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刘少奇、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评说道：“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刘）“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邓）叶剑英则诗兴大发，改辛弃疾《贺新郎》填词一阕：“将军一跳身名裂”，以为批判。如果说叶剑英多少有些的幸灾乐祸是叶与罗往日积怨的情绪发泄，虽不可取，尚可理解，那么刘邓言辞间的冷漠与嘲讽就实在让人惊诧莫名，而难以理喻了。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存在与人道施行，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才使人类社会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那么，为什么我们共和国这些最杰出的共产党人在1960年代的文革时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与悲悯呢？为什么他们对待自己蒙冤受难的同志会如此的冷漠无情呢？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使得宝贵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从他们身上流失了呢？

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的有关罗家的故事，或许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启示。1942年，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军区负责人宋任穷找到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妻子河南女青年郝治平介绍家里的关系，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的郝写给父母一信，宋派人将信送至郝家。其后，只要八路军找，郝家都尽为帮忙，郝父多次赶羊到敌占区，换钱后买药给八路军。翌年也就是1943年，郝母赶到太行山探女，将郝1岁女儿领会老家带养，6年后又送回解放区，适逢解放区土改，郝不得不动员母亲回家，以免有让地主成份的母亲躲避土改的嫌疑，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两地相距遥远，郝母又是小脚，往返途中其艰辛，不难想见。文革中郝父母以地主身份被赶出京城驱回老家，郝父不堪其辱悬梁自尽。

将自己从遥远家乡送来抚养了六年女儿的小脚母亲再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诚然是服从革命大义的需要，显示了与地主划界的思想觉悟，但觉悟划界的同时，却划痛了善良母亲的慈心，让亲亲人伦受到伤害；把一位曾经帮助过革命的开明进步的小地主进行批斗，扫出京门，当然是为了维护革命首都的安全和纯洁，表现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的同时，何尝不是对当年恩义遗忘的绝情。

如果说罗家故事或显轻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述发生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当扣人心弦，发人深思。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给革命造成重大破坏和威胁，上海地下党决定实施报复，周恩来深夜带领特科组潜入顾家，适顾妻正与一帮人搓麻将，其中一人叫斯励，是周黄埔军校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被拘留，正是此人释放了周。为不走漏风声，当时在顾家之人，除顾家一7岁女孩为周护卫外，包括斯励在内10数人全部遇害。同年6月，地下党员黄慕兰获悉向忠发叛变，第一时间向潘汉年报告，使周恩来等重要领导得到及时安全转移，事后周十分感激地对黄说道：“你们是党的一支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20年过后，潘汉年案发，黄慕兰受其牵连，有关人员将有关部门准备逮捕黄的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沉思良久，一声长叹，无以言复。（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灭门惨案》）

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白色恐怖年代，革命的极端性与残酷绝非未亲历者所能想象。在秘

密行动中，对叛徒不谙人事的无辜女儿做到手下留情，折射出严酷年代周恩来身上人道主义的难能可贵，但同时，对救命恩人不能网开一面，却是铁的革命纪律所要求的决绝与无情的表现。这种决绝与无情是由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迫不得已，情或可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和平时代，对于有功于革命事业同时也有恩于自己的同志的蒙冤，噤如寒蝉，莫可奈何，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共党内周恩来素以最具人情味而为人称道，又以最讲原则而令人钦佩。而问题的症结恰恰也就在此。“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中共铁的组织纪律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早已内化为周恩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则。黄慕兰为潘汉年案所牵连，而潘案为最高权力所钦点，因此，尽管周恩来明知黄为冤枉，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准则的限制与约束，（参见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不得不选择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而对黄的冤情听之任之，视若等闲。这就是说，在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这一原则约束下，周恩来不得不放弃了对黄慕兰可能的救援。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政治命题，这就是，一个政权最强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它最弱小的地方。（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其中的原理与人们常言一个人的长处往往就是他的短处有同工之妙。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归功于“三大法宝”，其中之首为“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和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崛起于20世纪的中国政治社会舞台，打败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原因所在，也是超越和压倒于其他政党的强大所在。然而，正是这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在指引驱使它的成员在毫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令，英勇决绝地进行政治行动，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也限制了党员自由意志的发展和独立思想的能力，约束甚至消解了党员乃人的人之常情。在进入和平年代，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这一情状更显突出。

以此为观照，刘少奇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对于罗瑞卿的态度问题则迎刃而解，原由亦昭然若揭。罗瑞卿突遭到整肃，刘邓内心并不认同，但却以默然的态度予以了接受，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因为这同样是党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做出的打倒决定。虽然刘邓与罗平时有着良好的私谊关系，对其工作也颇为赏识，也虽然明知毛的这一决定包含着错误，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限制与约束，在可能的仗义（直言与抵制）与服从（隐忍与执行）之间，选择了服从。“服从”这一政治行为准则起到了控制刘邓政治行为的作用，使其在服从最高权力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正义和情义。此与周恩来对于黄案的态度如出一辙，几无二致，都是党的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历史因素，那就是建国以来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出现的思想分歧进入1960年代后开始呈现出尖锐的冲突态势，最近的一次冲突就发生在1965年的年初，毛泽东以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让他参加会议和在会上发言为由大发脾气，甚至对着刘少奇说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威胁话。党内这种日趋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刘邓不会不感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因此，对打倒罗瑞卿的认同，除了服从的表示之外，还有一种难以明言的向毛输诚以自保的意味。随着批罗斗争的深入，也随着文革序幕的拉开，刘邓的压力越来越大，自保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仅是一般的表态已无济于事。于是，在罗瑞卿自杀而罪加一等时，刘邓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与嘲讽言说，既是基于党内对蒙冤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一残酷认识所做出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条件反应，又是借机划清界限与撇清关系的切割表示。以疾言厉色和态度绝决来表明自己与被打倒者不同的立场，是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屡见不鲜的一贯做法，目的仍不出表现对上级的服从与紧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以及对毛泽东权威的畏惧），使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高层领导在毛泽东做出打



倒罗瑞卿这一错误决定时，没有做出应有的抵制行为，不由自主地选择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决定，以致罗瑞卿后来的不堪其辱跳楼自杀。这种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所产生的政治行为，不仅令政治正义轻易蒙尘，使人道仁义趋于丧失，也为悲剧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罗瑞卿是被突然打倒，但其悲剧的发生却并非突如其来。回望历史，我们不幸地发现并可以肯定地说，在1940年代罗瑞卿妻子有违常情将自己来自遥远家乡的小脚母亲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之时，在1950年代周恩来有违常理对有功于革命也有恩于自己的黄慕兰冤情袖手旁观之际，甚至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批斗罗瑞卿不留情面的表现之中，决定罗瑞卿悲剧发生的因子就已经种下。我们进而不幸地发现，当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对打倒罗瑞卿不置一词，表示服从，在北京会议上对罗瑞卿自杀冷嘲热讽时，他们自己的被打倒已近在眼前，他们也就是在不自觉地为下一个更大悲剧的发生充当推手。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西言：“起先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依旧不说话；然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还有更为悲哀的发现，悲剧发生的历史逻辑链条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断裂，因一位具体的最高权力者的谢世而终结，到了1980年代，进入后文革时代，历史的逻辑链条仍在延续，因而悲剧仍有发生。极具警世意味的是，罗瑞卿、刘少奇等文革悲剧是由于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服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悲剧恰恰就是因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不服从”而产生。这看起来像是互为矛盾的悖论，却正好从正反两个面向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最高权力的无以撼动，而这一真相背后潜伏着一个人们极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深刻又残酷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

真理有时确实残酷，但它却让人们以一种现象的认识直抵现象的本质。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毫无疑问，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为避免悲剧发生的惟一办法就必须要对最高权力进行“撼动”，也就是进行约制。我们愿意从中国古训旁观者清的意义援引美国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一个深刻观察作为证明。麦氏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论及罗瑞卿悲剧事件时敏锐地指出：“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政治局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也就是最高权力没有得到约制，以至于放过了可以不让悲剧发生的“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之所以“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被放过，之所以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没有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是因为前已论及的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所导致的结果。

历史不止一种选择，悲剧并非不可避免。要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对限制与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进行反思与改造。这是我们对罗瑞卿悲剧历史原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一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1-7-28

~~~~~

【各抒己见】

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

• 应学俊 •

面对自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文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某些方面改革不到位或有偏差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有不甘心彻底否定文革者或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的人发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无可厚非的”这样的声音。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思想这毫不奇怪，如没有倒反而不正常了。

一、俞正声先生在讲“党课”时如是说

但最近又见“‘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先生，被《南方周末》称为“执政者的声音”，这不禁使笔者感到诧异而“咯噔”一下。因为，俞正声是在给上海交大5000多师生讲党课时如此表达的，且有“拓展性”阐述，这就无法使人将之与网络一般言论等同视之了。

俞正声在这次“党课”上主动谈到绕不过去的文革问题时这样说：“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须知，俞正声先生是在回忆了自己的母亲、妹妹等六七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后说这番话的，而且面对的是对文革如历史迷雾般认识不清又毫无实际体验的“90后”和“80后”，因此，就更增加了其所说的可信度。这也是笔者见俞正声此说“咯噔”一下的另一原因所在。

二、“‘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有违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规律，有悖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

如何看待所谓“动机”？我们可以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论述过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毛泽东还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笔者基本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把动机与手段、效果（或曰后果）割裂开来讨论，是形而上学的。我们为何不按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用文革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来“检验”文革的主观愿望和动机呢？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这样表述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请注意一开始说到的“被说成”三个字。

什么叫“被说成”？也就是说被毛泽东自己或其他人“说成”——常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语境中，在人们的正常语言实践中，这是一种否定的表达，即事实并非如此——一如我们当今所说之“被精神病”。所以《决议》紧接着阐述“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在重大理论上“混淆了是非”。笔者实在不明白俞正声先生所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可厚非”是指什么？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吗？从字面上看，只有如此说才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却恰恰已经为党的《决议》所否认。

为了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俞正声先生还予以论证：“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就明显有悖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了。在俞正声先生的潜台词里，“现在的许多事情”和毛泽东的“担心”是指什么？笔者以逻辑思维推理而得：俞正声这里所说之毛泽东的“担心”如果不是所谓资本主义复辟，起码也应当是指人民群众一致痛恨的党的干部、官员腐败问题，除此还能有什么样的“担心”呢？——于是，俞正声此说自然更符合当下中国一般百姓的心理，但也同时迎合了对文革被否定而心有不甘之人的心理，因而“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也就更容易被人接受。然而，这正是令人不安之处——

按俞正声先生的逻辑，文革的“动机”就是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现今恰恰在党内及官员中腐败严重，他们不正是所谓“走资派”吗？而且还一茬又一茬地前“腐”后继？现今出现的种种“问题”岂不是恰恰被毛泽东他老人家当年不幸而言中？那岂不是说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这一套都错了或基本错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当年的“担心”和所思考的问题都是非常“英明”的？按俞正声先生的逻辑，我们除了作此推论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此想下去，怎能不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毛泽东临终前还曾说这样说过邓小平——1976年前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走资派还在“走”……这也是毛泽东当年的“担心”吧？

然而，俞正声先生的“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不仅有悖党的《决议》精神，也有悖于历史事实（下文阐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面对我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大的这场全局性“内乱”，如今却违背事实、违背《决议》精神、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而来强调“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且进一步论证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俞正声先生如此论述意欲何为？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将会怎样？俞正声先生想过吗？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真的“无可厚非”吗？

既然“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一说法由党的《决议》所否定，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除了文革中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件可供分析佐证外，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足可以证明其发动文革的“动机”，而这在一般人的表述中提及并不很多。

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严厉批判了文革开始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挠”运动的发展以后，笔锋一转：“……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而题目命名为“炮打司令部”，使得文革的“动机”昭然若揭，结果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党内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二号人物）被打倒，并由此及彼株连全国各地的“司令部”中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所谓“走资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致波及无数一般干部、知识分子等惨遭迫害，还出现过匪夷所思的以薄一波、杨献真等为首的“61人叛徒集团”案，有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我们能说这样的“炮打司令部”的“动机无可厚非”？如果仅仅是批倒“刘、邓”倒也罢了，为何要开展全国性的文革，以致发展到在全国各地的“夺权”运动？难不成当时全国各地的政权都已经落入“资产阶级”之手？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历史的回顾。

将工作上正常的观点、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原则斗争，顺者昌逆者亡，是这一段历史的基本实质。这是导致文革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做分析。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垮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就是为了“反修、反资”而无其它个人因素吗？稍稍熟悉一点新中国建国以来历史的人都会清楚，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其力主的“三面红旗”尤其是“大跃进”方面确实负有决策错误之责，而在有些决策之初，中央其它领导并非没有提出不同看法，但毛泽东断然听不进，动辄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指着周总理说他离右派还有50米（所谓“反右倾”进行过多次，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受到处分）。在出现“大跃进”、“共产风”等一系列失误以后，面对现实，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调整，但他认为问题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自己有限承认失误或做调整可以，他无法容忍别人提出批评意见或是建议，他认为他的权威受到挑战——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彭德怀的冤案。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因难以找到和毛单独见面交谈的机会，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以呈述自己未表达完全的看法，结果彭德怀连同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对大跃进提出具体分析和意见的人，则被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全中国批判，终使“大跃进”的错误继续发展，导致出现大饥荒和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官方统计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多万，民间学者调查为2—3千万。（而据非精确统计，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人数也即一千多万），

在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危险边缘，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其实有分歧是正常的，通过民主的渠道，摆事实讲道理，把问题辩论清楚，服从真理，再统一思想。但面对工作中、思想上的意见分歧，毛泽东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1961年，为了应对国内危机，中央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到县委、部分大的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人。会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问题，统一了思想，但在核心层还是存在分歧。

分歧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坚持肯定“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在执行正确路线中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左倾”思想的错误这一根本原因。虽然决定给1958年以来因在“三面红旗”运动中有不同看法而受到“右倾”错误处分的中央及省部级领导甄别平反，但仍坚持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案不予平反（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没有分歧）；在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分析上，刘、邓、周等充分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看到主要并非所谓“自然灾害”，主要是人为决策错误的结果，刘少奇引用湖南农民的话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甚至非常不愉快，可以说种下了祸根。加上林彪乘机吹捧毛，说出现错误和问题“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等等。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见华夏记者网）

“七千人大会”以后，1962年国家经济进一步调整，为了让农民吃饱饭，在调整中出现了农村的“包产到户”和“责任田”，从中央到地方受到欢迎和支持，但这触动了“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不能容忍。

这一系列便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谓“1962年的右倾”，毛对此一直铭记在心，直到文革总爆发出来。事实上，文革开始可以说是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为标志的，而这篇文章正是批所谓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的。所谓文革“动机”由此也可可见一斑。难道这也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从以下资料，我们亦可进一步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同年4月12日，江青也曾说过，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以上见“文史博览”相关网页资料）

正因为即使实践证明决策严重错误，毛泽东对于他所主导的“三面红旗”也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所以他一直铭记在心，甚至认为要出“修正主义”。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为何不仅仅是斗垮“刘、邓”的问题，而是在全国斗垮所有曾经与刘、邓有类似思想倾向的各级领导，全国性大到省市县小到单位学校统统经历“夺权”运动这一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所有可以重新登上领导岗位的一定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人。因为毛泽东认为党内对于他主导的“三面红旗”等有失误、有错误的路线、政策有“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所有曾经对“三面红旗”运动有过不同意见的，曾经支持过农村经济调整乃至搞过“包产到户”的就是“党内走资派”，就属于文革的革命对象。请问，这样的文革动机“无可厚非”吗？

我们再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中所谓“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问题。实际上这也仅仅是在工作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观点上的不同。

1964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的“四清”运动（亦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针对农村党内和干部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整风运动，是要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整顿党风，毛泽东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通过亲自下乡蹲点，认为还是有什么“清”什么比较好，一提“派”就会使人联想到一大批人，他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党内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派”，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有什么“清”什么。其实刘少奇在蹲点搞四清的过程中也是相当“左”的，声势浩大，整了很多，很过火，但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在制订政策的会议上有多次正面争论，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这就是所谓“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而实际上，毛泽东坚持了他在“四清”运动中的主张，而且在文革中也继续坚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显其执着和不可抗逆的态度。

文革之历史渊源已经很清楚了，修正主义在哪里？谁要推翻谁？所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样的分析和表述是符合实际的。

请问俞正声先生，我们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吗？此说不仅有悖党的《决议》精神，大概同时也有悖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四、改革开放前和今天的“腐败”皆来源于体制弊端

在当今，确有一群心有不甘试图为“文革”翻案的人，他们或曰文革不能“彻底否定”，或曰毛泽东是为人民的利益甚至是为底层人民的利益而发动文革，因为毛泽东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派”，他们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把现今那些腐败的官僚统统打翻在地。出于对腐败现象的痛恨，这种心情或曰思潮可以理解，但因此而试图为文革翻案或以“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论在客观上误导大众，这是危险的。我们的国家经不起折腾了。

60后70后乃至90后，他们见到的主要是当今官员的腐败，加上我国对文革反思不彻

底，有些遮遮掩掩，使一些人误以为文革前官员是清廉的，仅仅是改革开放才导致贪腐成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有独立思维的人仅凭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可以想一想：腐败问题从上到下自解放初期起就一直存在，否则就不会有高、饶的腐败（反党是另一码事），就不会有刘青山、张子善，如果腐败不是成风，建国后就不会一直有所谓“三反、五反”运动（第一反分别就是反贪污和反行贿），也不会有后来的“四清”运动。如果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央有必要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对待吗？试想，在解放后不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贪腐都盛行到需要以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来整肃，到了当今在市场经济活跃的条件下贪腐自然有了更大的空间。

其实，不论文革前还是当今，出现腐败都是不奇怪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作为执政党有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威望，而民主监督长期以来是缺失的，“反右”以后全体国人更是噤若寒蝉，不敢吱声。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不错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执政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使得权力与监督成为一对难以解决好的矛盾。这是根源所在。

君不见，“反右”时因为“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或给书记提意见被打成“右派”的普通群众殃及55万多；像今天一样可以公开发表对政府或对官员不同意见而不被“整”甚至逮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试想，没有制约的权力能不腐败吗？改革开放，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民主监督仍然困难重重：君不见，多少人因举报而遭到迫害，“被精神病”，多少人因进京上访被拦截甚至殴打、关押，公民的监督权如何行使？党中央非常重视反腐，设立了纪检委，打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体制，仍然是弊端重重。君不见，纪检委书记本人就首先腐败了（如曾锦春），谁来监督他？谁举报他，他首先“双规”谁，不论是否党员。当然这样的官员最终还是落马了，但那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才可能做到的。另外，平心而论，有些官员其实也是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努力打拼上来的，未必都是买官卖官，最初也都是不错的官员，但在监督无力或曰几近虚设的体制下，他们手握“绝对权力”逐渐顶不住诱惑而腐败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最终在监牢中留下愧疚的眼泪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安徽原副省长王昭耀）。

如何以体制改革反腐、防腐，如何落实每一个公民的民主监督权，确保执政党的清廉、纯洁和活力，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也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在目前这样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从根本规律上考虑改革的出路，而出现“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并且认为文革发动者当年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客观上误导人们在潜意识中形成“文革合理性”的看法甚至向往“文革”，客观上导致否定改革开放的价值，动摇人们立志改革的决心，这难道不是非常有害的吗？

如果我们看看本文末所平实叙述的“文革10年历史回顾”视频，再认真客观地研究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革动机无可厚非”之说是多么荒谬！俞正声先生能够接受上海交大的邀请前往以“老党员”的身份平等、和蔼地讲党课，笔者也希望看到俞正声先生就这一问题能有冷静、平等的回应或曰“进一步阐述”。笔者届时一定洗耳恭听。

□ 原载作者博客

~~~~~

【百家争鸣】

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

• 诚 言 •

对我辈在文革时期正读大学、不幸陷入过那场浩劫的过来人，蒯大富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这位当年颇负盛名的“五大学生领袖”中的老二，自从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校后，立刻从热闹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不久关进“学习班”，随后被判17年。对其坎坷的遭遇，我有同情，也有感慨。对其撰写的回忆，既有阅读的兴趣，也有通过他的切身体味能警示后人的厚望。读完他最近发表的一连串回忆，觉得其中不乏大量的真实史料，不乏秉笔直书的揭秘和清醒的解读。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有过这样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既然拥有这么一笔丰厚的人生财富，为什么不能像大多数“造反派战友”一样，在后半生活得更明白些呢？以我对老蒯学识的估量，当不如此呀？

这是指其回忆中表露出来的一股荒诞的、非理性的、常人难以理解的“毛泽东情结”。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打破“两个凡是”之后，从中央高层、理论界史学界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体制实践作风等方面有了新的研究和评价。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记录了这一成果。由于可以理解的时代局限，邓小平又说不妨过二十年再全面评价毛泽东。现在，全面准确地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论上亟待分清是非的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能否推动中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富强国家的实践问题。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上，蒯大富明显落后于时代潮流，这里仅提三个问题。

#### 一、对毛泽东文革动机的严重误判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诩的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其对中国经济、道德、法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百姓生活甚至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破坏，可谓史无前例（有些方面不一定绝后），这是除了极少数铁杆毛左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在党中央作出了“全面否定文革”的结论后，有人马上又从动机上找说辞，以期对最高策划者再度美化 and 神化。蒯大富所说的什么文革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一说，就很新潮，正符合一部分人现在的胃口，颇有与时俱进的蛊惑力。问题是，毛泽东真愿意人民监督政府吗？从他蔑视法治搞人治、出尔反尔抓右派、随心所欲大跃进、背着领导集体（更莫说人民）闹文革，到最后以抓“五·一六”的名义把敢于向执政者进行些许监督的人民群众打下去，这一贯的言论和行为，有叫人民监督的一点点味道吗？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他自封“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他单独接见外国人的时候，他大言不惭“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能相信，一个无法无天的“秦始皇”，会希望人民大众起来监督他指挥的政府吗？

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现在对腐败强烈不满的情绪，早就有人在老蒯之前大肆渲染毛泽东恨腐败反腐败，什么“五十年代初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保证了中国二十年不腐败”，说得像武侠故事一样活龙活现。蒯大富现在才如是说，不过拾人牙慧。这里，姑且不谈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根本不容人民监督批评的政治体制，不谈他亲自砍去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条款为腐败分子提供法律保护，不谈他建政前后如何整治从王实味到彭德怀这成千上万的反腐志士，不谈他独享的巨额稿费多处行宫是不是特权这一系列陈年老帐。只说文革时期，同为大学生，别人要乖乖地下基层接受再教育，他的亲侄儿表侄女却能坐火箭做高官；学生的考试卷子无纸印，他的不同版式的“红宝书”却印达八亿册；国防工业稀缺的贵金属，一吨吨化为供人崇拜的圣物；一批批特制的贡品，满足着他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各种需求。真是举全国之力以奉一人啊！如果说这只是他个人享受，中国人多地广物博咋说也供得起，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用人之道吧！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五条接班人标准及“三忠于”、“四无限”、“三要三不要”这些当时最时髦最重要的用人原则，没有一条提到干部应当廉洁不能腐败。只要政治上忠诚，路线上紧跟，就是党应重用的好干部；生活上再腐化，群众再不满，也只算无伤大雅的“小节”。如他充分信任重用的老臣康生是个窃取国家文物的大盗，他亲自挑选提拔的新贵王洪文是个花

花公子。1974年，他不顾广大群众对党内不正之风的强烈不满，公然说“从前门进来的有坏人，从后门进来的有好人”，并以中央文件下发，极力压下了群众抗击特权的第一波努力。当年羞羞答答的“不正之风”演变为今日横行无忌的全方位腐败，“始作俑者”其谁？说搞文革为反腐败，一边歇着去吧。

更新鲜的，老蒯这样评价毛搞文革：“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魂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这句话真扯淡！为了他的“理想王国”，就可以叫别人没有理想甚至无法活下去？人人都这样自私蛮横，还成其为社会么？还配叫“社会主义”么？文革造成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800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哪一个哪一笔是他“自己的家当”？

一个顽童点燃别人的房屋看房子经不经得起火烧，是否也叫有“想象力”？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整治到人人像红眼狼似的互相撕咬，工人不能按时上班，农民无法安心种地，学生长期“停课闹革命”，亲自选的接班人哀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生命垂危时自己徒唤“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死后一帮亲信马上受到正义的审判，这也能叫“有魂力”？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讲话中曾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一些把动机和效果分开的白面书生，强调要用效果检验动机，大富同志当会知晓。怎么轮到评价文革的效果和发起人的动机时，这一重要原则又失灵了呢？

## 二、对毛是“民族英雄”的夸张定位

蒯氏把毛泽东夸为“一个有想象力、有魂力的领袖”之后，马上又奉送一顶“无论如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桂冠。支撑这一立论的依据他只说了两点，“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所以美国才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好在蒯大富没提到更能昭彰民族英雄形象的抗日战争，没有细说他“敢和苏联人斗”的细节，那里有一大堆新史料为铁证，更能说明被误导的某些问题，蒯氏不提，我也就避谈。那就专说这两战吧。韩越两国有共同之处，由于历史的原因南北暂时分开，国际社会希望创造条件，时机成熟后实行普选，再行统一。这一善意安排均遭到两国北方顽固阻挠并发展到武力相向。中国当年纯粹出于政治考虑，尽最大努力支援两国的北方政权，结果韩战打平，越战打赢。

如果时光永远停留在此刻，如果不细究两战起因，夸耀夸耀决策人的功绩也还说得过去。但时光照旧流淌，生活还要继续。在战平的朝鲜，北方政权家族世袭，由于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流氓政权”的统治者对我国时冷时热，只因巨大的经济依赖有时奉送一两句廉价的赞美，成为我们绕不开躲不掉的沉重包袱。反观南方，已建成民主政体，经济腾飞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不断吸引“逃北者”到来，且早与我国建交。今年是韩战六十周年，美、韩两国“煞有介事”地或纪念或庆祝，而我们的大小媒体却像没这回事似的鸦雀无声，不知其中奥妙何在。在打胜的越南，昔日的“战友加兄弟”随着羽翼渐丰，很快变成“黎笋集团”，由于矛盾太尖锐，我国不得不打一场可歌可泣的“自卫反击战”予以“教训”。更难逆料的是，原本与我们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越南竟动真格地搞起政治改革，执政党内实行民主有实质性进展，连反对党也允许合法存在，政府选举大有采纳战前国际社会建议之势。内部事务你咋闹腾我们不干涉，万万难以容忍的是，竟乘我们韬光养晦大搞中国模式之机，占我南海20多个岛礁，偷窃我们也十分宝贵的石油！其反动气焰竟嚣张到既不顾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委屈求全、也无视我方义正词严强烈抗议的地凛然大义！尤为卑鄙的，为了增大反华筹码，悍然认贼做父，把共同“打走了”的美国侵略者又请回来联合军演，对我示威加压。用大富同志也熟悉的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局势发展到今日，人们有理由反思，我国当初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付出近百万生命的



牺牲，难道就是为了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制造一个累赘和培养一个凶恶的对手？为了模模糊糊的“国际主义”和虚假一致的意识形态，值么？至于把美国打“趴下了”，我对美国的实力不了解，无从判断，唯愿蒯大富说的对。至于打出了“平起平坐”、打出了“中美友好”云云，我怎么听怎么像小孩子说的话。依我看，在两次战争之前，中美人民就相当友好。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办中国建大学（有一所就是清华大学，大富是否知道？）使中国引进现代教育，算不算友好？如果有人硬要说那是顺水人情不能算，那么，在“二战”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放手让日本打中国时，美国却先民间后政府倾力帮助中国抗日，算不算友好？六十年代初提出用粮食解困中国的饥民（被毛拒绝），算不算友好？六十年代末暗中帮忙使中国避免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核打击的危机，算不算友好？这些友好的先例，与那场战争何干？也许有人会傻乎乎地把中国的留学生留美不归、贪官们卷钱后往美国跑也当成了友好，那倒真不能算，相反只能说明中国还未实质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若什么时候美国人也往中国跑，钱也往中国存，我们才有资格宣称中美两国“平起平坐”。

民族英雄是伟大的，也是光荣的，但不是“无论如何”就可以当上的，要“有”论如何才行。同时，国家之间的友好也罢，平起平坐也罢，也不是打来的。打只是采用其它手段也无法维护国家正当利益时的最无奈选择。假若毛泽东依然健在，带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先恢复越南、菲律宾等蕞尔小国侵占的我国海域，后再设法收回前几十年在他手中陆续丢失的国土，我一定举双手赞同蒯大富的观点。当然，这个假设不能成立，但我依然期盼出现完成上述功业的民族英雄！

### 三、对毛“关心弱势群体”的主观臆想

在断言毛泽东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之后，蒯大富随即满怀深情地说：“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这也构成了他“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走”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反修反腐败——注）。这个问题情况复杂，我试着和老蒯同志商讨一下吧。

弱势群体、草根阶层这些名词出现于新时期，以前从未用过。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这种认识像“地球仍在转动”一样，成为新社会的公理。1964年炮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第一句解说词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可是，我们怎能忘记过去的苦难，怎能忘记毛主席带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这可是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诗人诸如贺敬之、郭小川们集体记下的史料啊，里面有“弱势”的影子吗？有“草根”的踪迹吗？就是你我在文革中，不也是声声喊叫“立志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苦难”只能属于解放前，现在怎么还会有弱势、有草根呢？再说，那时的主流观念是“种田也是干革命”，各项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上下。哪里有什么强弱之分？连歌曲都唱“毛主席是咱社里的人”哩！从逻辑上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不可能关心根本不存在的对象。正像你去朝鲜，硬要指着虽然面带饥色但自认为是全世界都羡慕的最幸福的人群，说他们里面有弱势、草根，你看人家咋收拾你！

简单的逻辑推理似嫌论据单薄，联系实际也成。强弱总是相对的，像农民阶层与其它阶层相比，一直绝对弱势，（毛不一定这样认识，如他痛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知识分子与掌权者相比、工人与干部相比、读书的孩子与已工作的大人相比、非执政党与执政党相比，前者都相对弱势（毛也未必这样认识）。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状况吧，看看伟大领袖是怎样关心这些群体的。

革命成功后，通过“土地改革”，兑现了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但农民怀中的《土

地证》还未来得及焐热，接踵而来的、毛亲自指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把它变成一张废纸，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彻底夺。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农民形同农奴，丧失了迁徙权、进城权、种植权、话语权、分配权、乃至做饭权要饭逃荒权。“七分人祸”的那几年，饿死最多的是农民。文革中农民多喂几只鸡，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劳动日”在0.15元以下的占全国农民一半。直到1978年统计，全国农民人平年收入还只有76元。

实事求是说，那时工人的境况好于农民，但与政府工作人员比，也相差甚远。工人实行的工资八级制，干部工资二十四级，与行政人员相比，工人最高工资不超过行政十五级。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公仆”的最高工资相当于熟练工的标准相差何止道里计！在“政治挂帅”、“反对经济主义”的动听口号下，工厂在六十年代初就取消了奖金和不少福利，文革十年未涨一次工资（全国各部门亦然）。在身份上，工人永远是打工的，不能“转干”；正式工、大集体、临时工、亦工亦农，壁垒分明。更要命的是，工人不能组建自己的工会组织，合法权益难以维护。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生态下，多少工人罹难、横遭批斗、清查或武斗而死！时传祥，一个勤勤恳恳的掏粪工，当过全国劳模，被打成“粪霸”迫害而死！遇罗克，一个肯思考的青年工人，只因说了几句常识常理，竟划为“异端”枪下丧生！正是工人阶层一直被夺了自我保护的合法权力，才为后来的下岗失业埋下了伏笔。

知识分子一直是毛泽东整肃的重点。他自进城后发动的大多数运动，就是针对有知识的人。城市的大知识分子固然要整，乡下的小学教员也不放过。他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查三代、查思想、向党交心、谈心、生活会、批判会、互相揭发、引蛇出洞、洗澡、脱裤子、破四旧、立四新、斗私批修、拆信件、查日记、关牛棚、下干校、学习班、劳教、劳改、直至石头砸死大刀砍死一枪毙命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他给知识分子安的罪行名目繁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他的思想、反对他的路线、AB团、托派、右派、右倾、内奸、海外关系、美蒋特务、偷听敌台、反革命、胡风分子、三家村、反党集团、黑线、修正主义苗子、白专、小爬虫、变色龙、政治扒手、黑后台、黑高参、教唆犯、黑手、反动权威、五一六、北决杨、学贼、戏霸、成名成家、三名三高、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党乱军、里通外国等等等等，花样随时翻新。正是他对文化的一轮轮摧残和对知识分子拉网式的大规模迫害，酿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社会良知沦丧、马屁文化吃香、学术造假遍地的可悲现实。

毛泽东一直把教育视为专政工具，把青少年变成“驯服工具”、“一块砖”、“螺丝钉”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为此，他在教材中公然取消公民教育，塞进愚忠“狼奶”；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经常“停课”为“运动”让路，文化革命耽误整整一代人；他的“阶级路线”使千万优秀青年失去读书机会，他的“斗争哲学”使懵懂少年变成欺祖灭师的野兽；他翻云覆雨的斗争策略使大批虔诚如蒯大富一样的热血青年横遭惨祸，他以“再教育”的手段使渴望知识滋润的学子变相失业；他毁灭了中华民族起步虽晚但一度生气勃勃的高等教育，使偌大中国再无一寸产生大师的土壤。

中国各民主党派在追求民主、自由、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召唤下，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执政党给予了强力的支持。“花瓶”一说揭示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共同尴尬，“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的对联道出了他们在毛泽东治下的全部辛酸。

同情弱势乎？怜悯草根乎？蒯大富能把自己崇尚的美好善良的人性来个“乾坤大挪移”，想当然地栽植到偶像身上吗？

□ 原载《凯迪论坛》2011-8-11

~~~~~

【抗拒遗忘】

一言难尽说文革

• 夏 韵 •

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家的一位朋友，曾对我们说过，有位采访过全世界200多位卸任、在任国家元首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1980年两次采访邓小平。问过邓：“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回答：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真的就那么难以统计吗？我茫然。如果说是因为中国之大，有人的地方就有文革在搞，整人致死的花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芝麻绿豆的“当权者”都可以套个罪名把他看不顺眼人整死，毛主席号召造反，没有被整死的人又反过来揪着当权派往死里整，引发全国武斗，后来毛主席要“收”了，当权派翻过来又一笔笔秋后算账——死人太多难以统计；那又如何解读每一个中国人都属于一定的单位——你所在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街道和农村生产队——的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严密性。自1949中国已没有民间社会，只要你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在“组织”的严密控制下，要统计个死亡数字有那么难吗？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讲得自己人弄死自己人，远远要超过战乱年代的死亡数字，堪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事，人不是蚂蚁啊，人命能含糊不清吗？

很多年轻人不明白，问，真的死了很多吗？为什么？我说，至少我认识的有十多位同事、同学、熟人文革里死于非命，还不算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里的冤魂；至于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悲剧和悲惨的特写画面是由具体的一只“手”完成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能掩盖的。说什么“人民”如何如何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揪刘少奇；说什么“人民”要打倒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那是骗鬼的，一切只不过假借人民的名义，弄得一幕幕悲剧仿佛成了只存在受害方没有加害方的独角戏。其实这只具体的“手”就存在经历过那些政治运动的人周围。凡经历者都心知肚明，不是各个单位里的“组织上”信任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这只“手”的。在“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年代，每一个非命之死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都凝结着辉煌灿烂伟光正。敬畏尊重生命是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兽的底线，是区分人间恩怨是非好坏对错的前提。在人类社会，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吗？人命关天，是人类所遵循的恒古法则。无法估算的死亡数字——整死了上到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的天文数字的人，难道始作俑者不该承担罪责？难道众多紧跟的“推手”一句“我是跟党走”就可以不忏悔？

历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反彭德怀、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只“手”从没有失手过。1966年的横扫，阶级斗争的调门高过以往任何一次，这只“手”熟门熟路，志在必得，得心应手。我们单位的政工干部、党员、积极分子，都邀宠成了红卫兵。言语行动中溢满横扫牛鬼蛇神，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使命感。如果文革是一台戏，他们才是角色强烈的演员。

文革过后，每当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官员升迁履历，我不禁在想：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帽子时，他们在干什么？邓小平两次被打倒时，他们在干什么；林昭张志新李九莲被处死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前卫”，足下焉有升官路；他们不“政治”，怎会出人头地，在劣胜优汰逆向筛选的政治环境里，不是“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人是难有机会升迁的啊。继而我明白了，因为他们，文革成了敏感的话题，因为他们，“文革宜粗不宜细”。因为他们，文革档案不能开放，文革研究文章难以发表，出版成了禁区；因为他们，反思和研究文革“实无必要”。

自定“十年浩劫”，又认定反思”实无必要“，捂着盖子是源于还要举毛这面旗，怕动摇自己继承的合法性；无意于彻底否定文革，无意触动产生文革的土壤，无意从制度上的弊端去寻找文革产生的原因，根子也在于“继承”二字。主流舆论一天也没放松把文革纳入“文革是坏人作祟，毛主席只是一时犯了一下混”的认知轨道。那怕天文数字的人命死于非命，红太阳依然最红。唱红依然是主旋律，哪管它唱得人成了傻帽，没了人性，没完没了地斗得血流成河。

把国人当白痴玩弄于股掌之间，打倒刘少奇，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给刘少奇平反，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难怪人家说中国没有逻辑，中国话里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来自西方的“辩证唯物论”搅合之后要多神通有多神通，要多灵验有多灵验。判定世事对错枉顾事实，只凭意识形态需要拼凑，而理由和借口从来都是专制者随手可从腰里一串又一串拎出来的。极权制度下什么都稀缺，就是不缺整人的理由，越是整自己人理由越好找，出手也越狠，像用箩筐把自杀致残的罗瑞卿将军抬到批斗会场斗争；像中南海里划地为牢囚禁共和国主席；像对黑五类开杀戒之前造谣黑五类造反要变天……

今日之文革翻案风使得所有继承权力的受益者左右皆难。一旦鼓吹二次文革势成，必颠覆改革开放，遭殃的不仅是已平反的地富反坏右，说不定有人会成为第二个刘少奇。当年刘少奇打着毛的“三面红旗”万岁的旗帜，推行违反毛旨意的“三自一包”，虽然救国救民于劫难，功在千秋，却因没占有话语权而名不正言不顺，反被毛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的执政者，只要还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所有的改革都没有堂堂正正的话语权，都是复辟资本主义，连强人治国时期的邓小平都佯称“不争论”，他不是不想争，而是争论不起，底气不足啊！毛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消灭私有制，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要改掉的正是这些。

每每看到帮闲文人把那个时代里阶级斗争的对象、被动方，和阶级斗争的主体、进攻方颠倒；把文革1967年的几个月说成是文革的全部；把文革描绘成牛鬼蛇神专了共产党员人的政；“把文革中受尽迫害的人和和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无关心“(巴金随想录)，我的心感到彻骨的冷。为何故意要国人集体记忆失忆，为何要造成历史缺失。因为不能触动毛泽东，不愿承认文革罪错是国家罪错，更不愿承认文革是人治体制的产物。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态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志。强制全民忘却，掩盖、修改不了历史事实，残暴血腥的文革已成为人们头脑中永不消失的记忆。没有受到历史追究的罪行不会得到宽恕，更不会被遗忘。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思语（美国）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